



从四方中心到阴阳五行的宇宙观

——中国文明的三观智慧（一）

核心阅读

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中国文明，是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以汉字为书写和交流语言，以四方中心、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中、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以礼、规矩等文化价值观为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

□ 段清波

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成果和获得的能力进步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文明都是由宇宙观、社会治理观、核心文化价值观构成，它们互为因果、彼此支撑。三者的不同是各文明差异的主要因素。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凝结物，其中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基因，是文明在不同时期由宇宙观、社会治理体系及核心文化价值观三者交互作用的产物。探究不同历史时期三者的特征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模式，是研究中国文明的必由之路，也是探寻中国文明独特智慧的根本。

宇宙观是不同时期关于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下人们思维方式的来源。宇宙观最核心的功能是为不同时期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

支撑，这一支撑不仅仅在文明社会时期如此，即使是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前也是如此。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日宙”，“宇宙”是万物的总称，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观主要包涵了宇宙的起源、天地运行等规则、天地规则对人间的影响方式以及途径、人世间在天的支配下的应对等内容。中国古代宇宙观是基于阴阳、四方、五行、八卦等概念进行关联构建的庞大体系，它视天地万物为一个有序的系统，这一体系将涉及人类世界的各种范畴，如身体、行为、道德、社会秩序和历史变化与天地、空间及季节转换、自然现象等所有内容关联起来。中国古代文明自产生后有两种宇宙观，即夏商周时期的四方中心观和战国晚期至晚清的阴阳五行宇宙观，它们分别为王国体制和帝国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

夏商周时期的四方中心宇宙观

在西汉中期“浑天说”出现之前，以天圆地方为主要理论的“盖天说”，曾在数千年间深深地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论是史前时期，还是王国时期、帝国时期，观测天象、敬授民时，从来就不只是一项纯粹的天文活动，它更是一项有独占独尊、君权神授意味的政治活动。

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龙虎蚌壳摆塑以及上圆下方的墓室形状、距今5500年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的闾丘方坛、约距今5000年的安徽凌家滩的式盘、距今4500多年的良渚文化祭坛和礼玉、距今4000年左右山西陶寺遗址的主表等，体现的都是“盖天说”中的天圆地方观念。

从观象授时到时空体系的建立，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突破。通过立表测影来

确定空间方位，并在观测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天地之中“择中”的观念，进而出现了“居中而治”的政治思想，居中是因为在此可以直接来听取天命。于是，具有人格化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天”这一形象就被创造出来，天的意志即为“天命”，早在《尚书·召诰》成书时“有夏服（受）天命”的天命观就已经成熟。王的权力来源于天，“君权神授”的观念也因此应运而生，上天与人王之间亲近或直接血缘关系最终得以确立。“受命于天、天命不可违”的意识贯穿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全过程，无所不在的天命观也是中国文明的独特现象。同时，天命观影响了古代中国宇宙观的发展和成熟，还催生和推动了祭天制度、礼仪制度的产生与完善。

中国古人崇尚的“地中大地观”中的“地中”概念是指，在“地中”处观象与祭天，是最高统治者独享的特权，它显示王或皇帝不仅是尘世间最高的统治者，更是天命的唯一传达者和执行者，拥有无可置疑的通天法力。

《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虽然没有特意谈到“上天”的概念，但他对天地、阴阳、万物之间辩证关系的相关论断，使人们相信了日月星辰的天体运转规律和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时代的宇宙观，会逐渐演化成为该时代文明体系下人们特有的思维方式。同时，受不同时代宇宙观的影响，人们的行为处事方式也必然会有所不同。

以商王、周王和其祖先为中心，王借助祖先崇拜而垄断神权，进而通过祭祀祖先达到和上天直接沟通。王成为集治权与神权为一体的化身，位于王畿四方边缘的异族政体拱卫着王的中心地位。

商周时期，墓葬设计的显著特点再现了死者生前的世界，今人可以从中探知古人的宇宙观。最高等级的王所使用的“亚”字形大墓，其中墓室中央棺椁中的王，是上天在人间的代



表，四条墓道代表着位于四方的方国及其首领，是四方中心宇宙观的物化体现，有着相同理念的“亚”字形徽标图案在该时期的青铜器上也屡有所见。

在将近250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明的思维方式从“择中”到“居中”，并通过“建中立极”的理论与实践过程，才产生了“中庸”或“中”的思想。受此影响，两汉之际出现了以汉长安城安门大街为基线、南北74公里长的地理、空间、文化意义兼备的中轴对称理念。

战国至晚清的阴阳五行宇宙观

战国之后的宇宙观由阴阳、四方、五行和八卦等概念相互关联而形成。阴阳与五行是古代两种不同的源远流长的思维体系，至战国后期才合二为一，成为帝国时期的宇宙观，为帝国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

阴阳观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结果，两种对立的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始终处于消长交替、不停运动之中的。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它们之间既能相生也能相克。战国后期，五行相克观作为自然界乃至社会运转的基本秩序建立起来，成为王权更替、事物变化的理论依据；到了西汉后期，五行又发展出相生的观念，至此五行相克相生观念完全成熟。随着阴阳观的不断发展，中国文明中“对立”“变通”的思维方式得以形成，逐渐成为人们分析、评判事物的依据。

帝王陵墓的设计会体现唯王独享的通天宇宙观，天地阴阳是最主要的表现内涵，具体内容是具象和意象的天象。这些内容一般被描绘在形似天穹的墓顶，这一现象的出现始于战国后期。至秦始皇陵时，墓室形态呈现出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构造，将天地阴阳五行（二十八星宿、帝国版图、水德）都模拟表现在墓室中。

（上接1版头条）

第五，建设生态经济体系，在“五项重点工作”上突破，加快构建“生态环境优美”新格局。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问题一直伴随人类活动而存在，尤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工业化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呈指数增长，环境问题随之加剧。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我国工业化是时间压缩型的，但几十年高速增长并不能从总量上节约资源环境要素投入，由此在短时间内积累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成为发展瓶颈和民生痛点。现在国家实力大幅提升，绿色低碳技术迅猛发展，使我们有条件解决这一难题。环境问题的表象是环境损耗超过了再生能力，根源在不合理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好的环境质量和好的经济质量是一致的。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关键在树立正确思路，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减少资源索取和要素依赖。我们将坚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战略思想，树牢大局观和长远安全观，履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政治责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扎实推进节能减排、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污染防治、国土绿化、生态建设“五项重点工作”，谱写美丽中国建设新篇章。

第六，抓住民生关键问题，在推进“三个着力”上突破，加快构建“人民生活幸福”新格局。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辅相成，发展为改善民生奠定基础，反过来，改善民生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老百姓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需求层次上升。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改善民生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党委政府主要是保基本兜底线、促进公平可持续，一方面保障好基本民生，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重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以更好更多发展成果满足多样化民生需求。我们将着力抓好普惠性民生工程，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着力破解结构性民生难题，解决好养老、城市管理、住房保障等制约人们美好生活实现的突出矛盾；着力办好扶助性民生实事，尤其要下足“绣花”功夫，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下一个民族、不丢下一户一人。

（上接1版二条）

“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改革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全面的改革。为落实这些改革内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任务分解为336项重要举措，逐一确定协调单位、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方案，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化

4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它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的5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第一，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才迎来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

第二，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就在农村和局部地区铺开，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农产品日渐丰富，但城市经济因延续计划管理体制未见大的起色。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此后，经过不懈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四梁八柱。同时，要求围绕这三个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

性地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认可，也是使市场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里程碑。无疑，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1979年初蛇口工业区设立，到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从1984年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到1990年中央推进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藩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吸收利用外资实现新发展，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局限于引进来，更提升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

第四，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1999年3月，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能够从根本上保障经济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下顺利发展。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必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五，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我国人民生活图景。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

得到逐步改善。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4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在4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我们回顾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改革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短短几年农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并倒逼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市场化带来的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可估量。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家创新创业的活力无限焕发，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一半。在创新方面，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近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一倍，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有与市场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不动摇。

三是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

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新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五是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经过40年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我们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些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弄潮儿已经提前达到富裕水平。无论是先富起来的群体，还是生活小康的群众，都有了新的关切：一是个人财产能否得到保障？二是人格尊严能否得到保护？这两个需求一体两面，中央历来重视。只有加强人格尊严保护，才能更好地保护合法财产。与此同时，资本从收益低的地方流向收益高的地方，财产也从产权保护水平低的地方流向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地方。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护不到位，就会导致财产和精英人才的流失。要杜绝这些现象，必须夯实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由此来看，对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

（作者系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